

2 亿余元虚开发票案背后的“猫腻”—— 娱乐接待统统公款报销

浙江破获特大贩婴案 被拐人数达 27 名 涉案人中有一名退休医生



老总唱歌钓鱼的各种娱乐、礼金红包、超标接待……这一切统统都要买发票公款报销。湖南长沙警方近日侦破一起虚开发票大案，揭开了违规公款消费的冰山一角。

2012年以来，犯罪团伙虚开倒卖发票2亿余元，不少涉案单位用买来的发票“洗白”不当开支，仅长沙地区就有40多家单位在列。记者调查发现，近年来，随着中央八项规定、反四风的不断

深入，请客送礼、吃吃喝喝、滥发津补贴等行为得到极大遏制。但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，上述不当消费依然存在，并通过虚开发票、虚假列支的方式变得隐蔽甚至“合法化”。

犯罪团伙四年倒卖2亿多元真发票

“开的都是真发票，全部来自长沙地区的超市、商场、酒店。”长沙市国税稽查局纪检组长尹波说，一个团伙涉嫌虚开发票的金额高达2亿多元，这是自2011年虚开普通发票入刑以来湖南省查获的第一例，案值之大在全国也比较罕见。

现年32岁的王某虎是河南邓州市人，有犯罪前科。在做回收商场、超市购物卡生意时，他发现北京不少“卡贩子”还通过倒卖商场、超市的发票获利，于是动了倒卖发票的念头。2012年，王某虎来到长沙，发

现当地的发票贩子卖的都是假发票，根本不知道卖真发票也能赚钱。王某虎于是想方设法与长沙商场、超市的营业员、财务人员搭上关系，站街揽客接到“活儿”后，就按要求偷偷将发票开出来。赚到钱后，王某虎购置了高级轿车、名牌服饰，出手阔绰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“大老板”，在“圈内”渐渐有了“名气”，很多假发票贩子纷纷加入其团伙。“在利益的诱惑下，王某虎构建了一个以他为核心，涉及下线30余人的贩卖发票犯罪网络。”长沙市经侦支队副队长陈耀松说。

自2012年以来，王某虎团伙通过散发名片、张贴小广告、群发短信、散布网络广告等方式揽客接单，以开票金额的1.5%至6%收取购票者的“开票费”，以开票金额1%至3.5%的比例给相关财务人员或营业员支付好处费。截至案发前，该团伙共涉嫌虚开普通发票金额高达2亿多元。根据群众举报，2015年5月，长沙市经侦支队将主犯王某虎、秦某伟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，捣毁窝点2个，暂扣涉案电脑等物品一大批，收缴伪造的各商场、公司印章41枚。

买发票用于各种各样“说不得”的开支

大量发票流向哪里？负责经办此案的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六大队负责人刘勇说，涉案购买发票的多为各大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、医药公司、房地产、旅游公司等企业，也有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国企。尹波介绍，王某虎团伙开出的普通发票名目多为办公用品、电脑耗材、餐费、会议费等。在提供真发票的同时，他们还能提供假冒的空白明细单，再盖上私刻的商场、超市、酒店的印章，购买人可根据需要填写具体内容。“各单位购买发票的目的五花八门，如发放津补贴、请客送

礼、协调关系等。按规定，这些开支在单位账目都不能列支，于是就通过买发票报销。”陈耀松说，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套取单位资金，用于各种各样“说不得”的开支。湖南省一位国企工作人员说，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，礼金红包、超标接待等公款消费多少仍暗中存在。按照国企财务规定，这些支出不能直接入账，经办人大多会找发票贩子购买可以列支项目的普通发票来报销。“不管什么性质的单位，虚开发票、套取资金的行为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其中极有可能隐

藏腐败问题。”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柏顺表示。近年来，各级纪检、审计机关查处了不少虚开发票、套取资金的典型案例。譬如，2015年，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科协进行的专项巡视反馈通报显示，中国科协财务制度不健全，经费管理使用不规范，虚假发票报销、违规发放补贴等现象多发。2014年6月，审计署公布的中投公司2012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显示，2010年以来，国泰基金使用假发票套取资金4330.04万元，其中2012年发生1793.25万元。

加强对富余发票的管理 报销制度需完善

发票贩子为何能从商场、超市开出大量真发票？长沙市一家大型超市的财务总监告诉记者，大型商业零售企业都是按照报表纳税，很多消费者不一定会向商家索要发票，因此商场、超市、酒店、餐饮企业都有富余发票。尹波介绍，如果一家超市一年的营业额是2亿元，但顾客索要的发票实际上只有1亿元，就形成了1亿元的富余发票。这些富余发票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要斩断倒卖发票的利益链，必须从源头上防止富余发票流出，公安、税务部

门应加大查处力度，督促涉案的商业零售企业严厉打击“内鬼”，堵住漏洞，对富余发票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督管理。“不按规定填开发票名目，这种行为也是法律法规禁止的。对于这种行为，目前主要是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，但处罚力度较小，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。尹波建议，税务和司法部门应加强联动，依法严厉打击不如实填开发票名目的行为。严打发票的买卖关键在于遏制需求。袁柏顺表示，在审计监督机制方面，相关部门应该创新

“人防”“技防”措施，推行账目倒查、发票倒查，精准识别虚开发票、虚假列支等行为。在财务管理方面，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要完善发票报销责任体系，制定严格的发票报销程序和要求。比如，在报销时，要求经办人必须提供机打明细单，对人工填写的明细单实行严格限制，增加虚假列支行为的操作难度。“除了严惩发票贩子以外，还可以按照法律规定，严查一批受票金额较大、套取资金较多的单位和个人，提高违法成本。”陈耀松说。 据新华社

偏僻的老房子中为何会传出不同婴儿啼哭声？接到群众举报后，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警方由此侦破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。经查实，被拐卖儿童均为刚出生不久的婴儿，人数高达27名。日前，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卖儿童罪，对此案26名被告人提起公诉。此案被告人中，有一名曾在温州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的女医生。

老房子传出婴儿哭声

2015年3月29日，苍南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，称苍南县灵溪镇双益小区旁的一老房子内经常传出不同婴儿的哭声，而房主年龄偏大，不像婴儿父母，怀疑其中有蹊跷。接警后，苍南警方立即着手侦查，对该房子进行多日守候，发现房内人员存在拐卖儿童的嫌疑。去年4月4日下午，警方在房内抓获正在进行拐卖儿童交易的章某、朱某等9人，并解救出1名男婴。

审讯发现，犯罪嫌疑人章某此前有多起贩卖儿童的行为。在拐卖婴儿的过程中，章某还带上了女友朱某和她的儿子。据了解，此案中大部分婴儿经跨省多次转手买卖，层层加价，主要涉及云南、浙江、福建、河北等地。这些涉案人员之间不少“沾亲带故”，其中有“情侣档”“父子档”“夫妻档”，甚至还有一家五口“齐上阵”。该拐卖儿童团伙的“利益链”中，处于“介绍”“抚养”“运送”等环节的人员均获得“报酬”，介绍人获取介绍费，抚养人、运送人则获相应工资。

“婴儿都是父母不要的”

据多名被告人供述，一些婴儿都是在出生后遭遗弃。对此，检察

机关认为，这仅是被告人单方辩解，对婴儿来源侦查部门还要做进一步调查，如果还有漏罪行为，则要进一步追責。在温州市检察院依法审查查明的事实中，温州退休妇产科女医生李某涉及的被拐卖儿童有4名。2013年上半年，李某联系章某，约定贩卖1名男婴给章某。之后，章某联系周某、范某共同出资5万元，在温州市区“水景苑”小区李某住处购买这名男婴。该男婴被章某、周某、范某带回苍南后，经周某联系卖家进行转卖。此后，李某又将三名婴儿卖给人贩子，并收取十余万元。对于被指控的拐卖儿童事实，李某百般辩解：经她手的婴儿都是孩子父母不要的，对方要求她帮忙介绍收养人，她并未从中谋取利益。

26人被提起公诉

公诉机关认为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，拐卖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，有拐骗、绑架、收买、贩卖、接送、中转等行为，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即构成拐卖儿童罪。公诉机关称，李某多次贩卖的婴儿均是联系章某等人购买，她主观明知章某等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还多次贩卖，她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。此次被提起公诉的有26人，其余9人另案处理。这26人分别来自温州苍南、温州市区以及福建、云南等地，其中年龄最大的79岁，最小的27岁。截至目前，此案中被拐卖的27名婴儿中有15人获救，其中解救后寄养在收买人处的有10名，寄养在福利院的有5名。根据相关法律，检察机关已经建议将寄养在收买人处的婴儿均送福利机构安置。 据《京华时报》

上海一栋三层楼房倒塌 初步判断为一楼违规施工所致

4月11日13时许，上海松江余山镇西霞路上一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三层楼房突然倒塌。目前，救援人员抢救出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。还有疑似点发现生命体征，抢救正在进行中。据了解，该施工项目没有办理任何手续，房屋的业主、施工负责人等已被警方控制。

房屋倒塌前一楼在装修

周边居民称，倒塌的房屋共有三层，一楼二楼原为一间农业银行，一楼为柜面，二楼为办公区域，但在六七年前就已关闭。银行关闭后，由房东出租给他人，事发时一楼正在进行装修。附近居民称，房屋倒塌前就有明显的震动，大部分在屋内的人都已撤出。事故发生后，公安、消防、武警、卫计委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。

一妇女和男童被民警救出

附近居民称，现场，一女子在

三楼大声呼救，底楼的废墟中，有人被困。民警来不及思索，直接爬上废墟，发现墙角处有一女子和一个小男孩被困在石板下。民警一面向楼上的女子呼喊，叫她保持冷静，一面徒手扒开碎石，逐块清理。随后，民警分别将男孩和被困女子救出。目前两人均无大碍。据搜救人员介绍，经排查，登记在册的15名租住人已全部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妥善安置，施工队也已安全撤出。此前，他们发现两处疑似生命迹象点，目前，两处生命迹象点已经排除了一个，另一个点中，他们怀疑仍有人被困，救援人员仍在积极营救。 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